

东吴名家·宋炳辉

# 论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

宋炳辉

**摘要：**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文学存在形态，又是中外文学史展开的重要场域，也是人文科学诸多相关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化空间涌现了大量汉语翻译文学，这一体量可观的跨文化存在，有待诸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本讲演录意在从世界文学和世界翻译文学的系统中，分析作为跨文化实践及其产品的汉语翻译文学，讨论翻译文学的多学科意义，以及相关学科的协同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的必要性。

**关键词：**汉语翻译文学；强对应性文本；弱对应性文本；翻译向度；多学科视域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多学科视域下的汉语翻译文学”<sup>①</sup>。大家可以看出来，它不是一个论证性质的题目，我的意图的确首先把它看作学科拓展性质的论题，其次才需要在相关的环节上，尽力对这个题目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和观点，进行必要的举证和说明。总体而言，我是想和各位一起，针对汉语翻译文学，从跨学科的角度来作一次移动式的、变换角度式的观照。看一看立足于语言文学这样一个大学科，怎样来看待汉语翻译文学这样一个文化存在——包括作为文化产品的存在和作为文化实践的存在。它在中国的文学学科史，至少包括中、外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的学科史上，越来越多地被不同（二级）学科领域所关注，也引发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讨论。这一系列学术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汉语翻译文学，在倡导

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还有哪些学术潜能有待于发掘和发挥？我们来自不同的具体学科领域（中、外语言文学下的不同二级学科）的研究者，如何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在跨学科背景下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群”，我未必都有明确的答案，但很有兴趣向大家提供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也特别期待和大家一起看看沿途的学术“风景”。

## 一、学术分科发展与汉语翻译文学

先来说说关键词。我的题目是“多学科视域下的汉语翻译文学”，这里的“多学科”，我们

<sup>①</sup> 本文原为“多学科视域下的汉语翻译文学”的演讲记录，这次发表做了较大程度的补充修订。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严格说来,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其实都是跨学科的现象,扩大一点说,人类的文化和生活本来就是“跨学科”的。而所谓学科,是在现代学术的发展、分科的意义便于我们认识、研究、分析而逐步形成的。现代学术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两个趋势,一则是不断分化,一则是不断融合,这两种趋势始终并存,我套用章太炎对进化论的分析概念,把现代学术发展的这种倾向也叫作“俱分进化”。因为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所以从多学科的意义看待汉语翻译文学,其实也意味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个领域。

再说“汉语翻译文学”。很多相关论著在“翻译文学”之前用国别来限定,比如“中国翻译文学”,但国别限定的结果是,概念的所指不清晰,或者在语用中容易有偏差。因为“中国”的翻译文学应该包括中国语境中以非汉族语言(蒙、藏、维、哈等)呈现的翻译文学,而用特定语言来限定这一概念,就明晰得多。其次我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汉语翻译文学”,一方面可以指称作为产品的翻译文学,也就是指译入语/目的语是汉语的那些翻译文学作品,这是指这些译文本的集合,所以它是一种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汉语翻译文学扩大到指称一种文化实践行为,即从产品往前推,就可以推到翻译的行为、翻译的活动。进而对翻译活动,我们又可以做不同的区分。比如说它们的译者分别是什么人?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完成翻译行为的?它的原语是哪一种语言,属于什么样的文化,历史上被归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再往前推的话,那就推到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国文学这一学科领域了。总之,汉语翻译文学,是指汉语文化中在各历史时期以汉语为目的语(译入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指展开这种翻译行为的实践活动。所以,在今天的学科分化语境中,无论是作为产品,还是作为跨文化的实践,汉语翻译文学都是一个跨学科的观察和研究对象。

在世界文学多元系统中,汉语翻译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作为一种翻译文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对象,汉语翻译文学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即翻译文学本来就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

现象。在人类的文学实践中,以原语路径阅读非母语的文学作品,在全部文学阅读实践(延伸至阐释与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毕竟不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文学阅读(指书面语作品,对于口传文学就是听与说)活动都是以母语方式进行的。当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用习得语也就是用第二、第三语言(外语)直接阅读非母语文学作品,发生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现在全民外语能力有了普遍提高,但从文学活动整体的阅读比重来说,外语阅读肯定没办法超过母语阅读。由此可见,通过母语译本阅读外国文学,对于我们而言,即借助于汉语翻译文学阅读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是文学生活的重要方式,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在英语或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其他语言文化中也都有着同样的遭遇。比如对于意大利读者而言,他们也要通过翻译把外国文学作品译成意大利语(据说意大利的翻译文学作品占有所有文学出版物的25%以上),供意大利的读者阅读。因此,翻译文学在所有文学阅读中有相当大的占比,这是一种人类文化的普遍现象。

但另一方面,汉语翻译文学也有它特殊性的一面。这里所说的特殊性,不仅仅体现为把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也即特殊的目的语或译入语,而是包括了我认为更重要的内容,后面我会展开分析。总之,如果将汉语翻译文学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系统的翻译文学系列中看,一方面具有其普遍属性,同时又有它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学系统中的翻译文学的特殊性。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在认识汉语翻译文学,或展开汉语翻译文学相关研究时首先需要厘清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在现代分科体系下进行汉语翻译文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进入路径和展开方式。比如通常我们可以从译者的角度、从读者的角度、从译本研究或者阐释角度进入汉语翻译文学,也可以从通常所分的中外国别文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学科进入,甚至还可以跨越到语言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进入。我接下来的分析,并不涉及上述所有的跨学科领域,而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主要聚焦

在与翻译文学直接相关的中、外语言文学的相关学科群,围绕其中涉及的相关研究方式展开讨论。

就中国的学科发展境遇而言,自新世纪以来,外语学科面临新的重大挑战,学科生态的发展、转变也较快。首先是面对全球化加速、知识与信息爆炸、全媒体膨胀、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的时代趋势,外语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现在我国的外语院校以及综合性高校的外语院系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以外国语文为基本学科的大学设置,并非一种全球性现象,而是只限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才有的制度建构,这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有关,也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势位落差有关,它与后面讨论的汉语翻译文学的特殊性有关,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今天外语学科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在多大意义上还是一个大学学科专业。如果仅仅是语言技能的学习,那么它可能只体现出一种工具性特点,与一个高等院校的学科专业不相匹配。那么,面临空前挑战的外语学科从业者,如何拓宽专业视野,增强专业能力?尤其是如何从语言出发,拓展到以语言为基础的、与语言直接相关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也就是如何引入多学科的、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重新审视学科的研究对象,反思学科的研究方法范式,这应该是外语学科面临空前挑战时,必须正面应对的核心问题。应对得好,危机可以转化为转机,挑战也可能带来机遇。

为了应对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部刚刚把外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重新作了划分,把原来大部分按外语语种划分二级学科的方式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将整个外语一级学科分成五大领域,即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其中翻译学赫然在列。其实,在五大领域划分之前,翻译学就已经被作为自设的二级学科来对待了,但这次正式被列为五大领域之一,意义又有不同。按我的理解,它已经超越了原来学科体系中作为二级学科的翻译学概念。五大领域中的翻译学,所包容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这是我所理解和解读的五大领域划分举措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与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话题有关。如果从与翻译相关性的角度去看五大领域,那么翻译之外的其他四大领域都和它有着内在的关联。也就是说,不论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还是区域国别研究,哪个领域都离不开翻译,离不开翻译的研究或实践。这也是我今天和各位讨论如何看待汉语翻译文学这个话题,从目前外语学科最新发展角度的一个切入点。这两个方面都与翻译研究的多学科性质有关。

而关于翻译文学的多学科性质,我想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作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从翻译学的学科意义来看待汉语翻译文学;第二是作为国别文学的重要内涵;第三是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翻译文学。然后,我将分析的是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元意义和它的中国特性,也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及的,汉语翻译文学在整个世界翻译文学系统中有哪些独特性?我想,这也是我们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文学来观察汉语翻译文学时,理应具备的自觉和理应关注的问题。

## 二、作为翻译学研究对象的翻译文学

我们知道,翻译是人类文化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非常古老的实践活动。无论中西,翻译几乎与语言一样古老。《圣经·创世纪》记述的以色列人约瑟兄弟旅居埃及,就需要翻译。《礼记·王制》记载了我国周代的翻译情形和专司翻译者的称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sup>①</sup>可见,古代中国出于跨文化交往的需要,不仅有人专司翻译,而且与不同方位的异族打交道,还有不同的称谓。据说到汉代时因多与北方民族打交道,“译”的称谓便成为主流,慢慢就替代了“寄”“象”“狄鞮”等不同方向的“翻译”名称。这种各民族普遍存在的跨文化实践,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角度看,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现象,因此可以有多种观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第3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察和研究的切入方式。在这里,我只是想从两个方面,即从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两个方面,尝试回答如何看待汉语翻译文学这个问题。

在翻译史视野中,翻译通常是指在传世文献、资料中留存下来的那些翻译产品/文本,而翻译文学则是在翻译文本的分类史上,经由从古到今的不断细分而逐步显现的。我们知道,在文献留存的意义上,宗教典籍是人类翻译史早期的核心翻译文本,到后来就扩大到文学、思想和史著经典,进入现代社会后,翻译文献日益多元,无论是翻译文本的种类还是数量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从翻译成品种类的角度看,翻译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大类,即宗教典籍翻译、文史经典翻译、综合文献翻译。但如果我们把翻译还原到一种跨文化的实践行为,翻译的种类其实远远超过了这三类,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宗教典籍翻译、文学翻译和综合文献的翻译,其实从古到今的所有跨语言的交往,都要借助于翻译来展开,它可能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口头的翻译,其实也是翻译的一种,而且是数量更大的翻译实践。所以,从翻译史角度看,随着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不断展开,翻译的内涵是不断扩大的。

与当代学科分化趋势相呼应,当代翻译学体系的分科也越来越细。如前所述,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无论二级学科还是其下的三级学科方向,都以不同的方式涵括了翻译学的内涵,比如说笔译研究、口译研究等等,甚至还有更细化的机器翻译研究等等。与此同时,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所采用的学科理论也是越来越多样,翻译研究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不过我这里想要表明的一个判断是:尽管翻译内涵在不断扩大,但翻译文学或者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行为的文学翻译,在整个翻译研究谱系中所处的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也就是说,相对于翻译学而言,在所有的翻译实践当中,包括书面翻译、口头翻译以及机器翻译的研究中,文学翻译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重要性的体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想要说的另一个方面,是翻译理论视野中的翻译文学。进一步的表述就是,在翻译实

践和翻译研究不断发展的今天,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对翻译理论还具备怎样的意义。翻译理论的视野,这是一个大问题,当代翻译研究将诸如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引入翻译学研究,形成众多翻译理论学派,在这里无法一一展开。基于我的可能并不完整的观察,我只提出一个判断,那就是很多翻译理论(当然不是全部)的阐释力,都需要用文学翻译的实践来验证,或者要举文学翻译为例证,即便是人工智能翻译的某些有效性,也须用文学性的语料去测试。这就说明了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对翻译理论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尽管当代翻译研究的对象越来越丰富,翻译文本的范畴不断扩大,文本细分程度也日益提高,但正因为这样,翻译文本/语料的基本分类就显得更加重要,它往往决定了我们对众多翻译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也决定了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体地说,针对翻译理论,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代社会资讯爆炸式增长,需要翻译的文本类型也多种多样,而对应于不同类型的文本,不同的翻译理论各有其阐释的有效性。也就是各病各药,没有包打天下的理论。反过来,以不同性质的文本及其翻译实践来验证某一种理论,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

### 三、原文—译文的强弱对应和翻译向度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尝试提出一对分析性概念,就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强对应”和“弱对应”关系概念。所谓“强对应”,是指译语文本和原语文本之间具有高度对应关系,即在语言表达的各部分(词、句、段落与篇章)的精确对应;相反“弱对应”就是指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模糊性、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用这一对关系概念对照基本分类下的两种翻译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类文本的翻译是强对应的,而文学类的、艺术类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包括有些宗教性文本、哲学性文本,因为对宗教的、哲学的或理论性概念的理解本来也包含了阐释上的多义性)翻译,广义的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其原语

和译语之间则是一种弱对应。

其实,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展开的很多理论问题,包括翻译的本质与功用问题,翻译的标准问题,翻译方法与策略问题,等等,都与原语与译语的对应性——对应程度和方式——有关,也即都是针对或关涉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换句话说,假如在翻译实践中,原语和译入语客观上都可以实现一种强对应、精确对应关系的话,那么翻译研究中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很多翻译学的理论问题,就都不那么难解,也不那么重要了。比如译介学理论中特别强调的译者的创造性、创造性叛逆问题,翻译实践中的对错问题,以及关于“信、达、雅”之“信”及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其实都是围绕着原语与译语的对应性而展开的。

因此在我看来,若要深入展开翻译理论研究,就有必要把文学翻译,就是(体现语言艺术的)文学类的文本/语料和其他非文学的信息类的文本,首先做一个基本的区分。之所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区分,就是说这里的“文学”可以是宽泛意义上的。这个区分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理由就是信息类文本翻译和文学翻译有着不同的特点,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息类文本翻译中的对应性(原文—译文,或原语—译入语间的对应性),相对于文学类文本而言,往往在程度上明显较高,规范性也明显较强。与此对照,文学类文本在翻译中的对应性则明显较弱。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引申,举一个相对极端一点的例子来说明。比如,我们若要翻译一个应用类的信息文本,如一份笔记本电脑说明书,这种文本语言,包括其中的术语,所关涉的学科背景,属于自然科学,它在不同语言系统中,存在着约定俗成的、普适性的概念系统,因此翻译这种文本时,原语和译语之间,必然存在着很高的对应性,这种翻译就属于一种强对应关系文本的翻译。在强对应关系文本的翻译中,如何翻译,怎么翻译更好,标准是什么,惯习又如何,等等,在这些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清晰度就比较高,它所面临的困难相对就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译者的语言能力——原语和译语——都是过关的,并对文本中涉及的术语和句子表达本身都有相应的了解,他就能够比较

清晰地用对应性的译语表达,我们评判译本的好坏时,争议也比较少。前提就是有关计算机的概念系统在不同语言间的对应性很强,甚至是精确对应的(专用词汇比例高)。

但是文学—艺术类文本,相对于信息类文本而言,恰好处在另外一个极端。文学文本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与文本的内涵有着深度的关联,语言既是传达意义和情感的工具体,但它的功能又远远不限于工具性质;二是文学所传递的信息,包括文学形象、文化意象、文化语境,乃至这种语言背后的信仰神话、文化传统等等,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两个特征归于一点,就是特定的语言与其文化之间的血肉相连,而翻译就是要撕裂这种血肉关系,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译者从原文中理解到的意涵。这也意味着,新的表达语言与原语之间的对应性是有限的。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于翻译文本/语料的强对应和弱对应分析是一种相对区分,也是一种认知框架,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换一句话说,信息爆炸时代的海量文本,从翻译的跨语际对应的分析视角来看,它们处于从强对应到弱对应的一个光谱上,而信息类文本和文学类文本则处于这个光谱的两个端点上,其他大量的文本,因其翻译中的不同程度的对应性,分别处于这两个端点之间的不同位置上。

相对于信息类的强对应性文本,文学性的弱对应性文本的翻译,所面临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不仅在实践层面充满了变数,在相关的翻译理论问题上,面临的问题也最多。比如文学翻译的“信达雅”到底怎么把握(在我看来,“信达雅”不是翻译的标准,而是译者的策略)?能不能做到三者兼备?如不能兼顾,是先考虑“信”呢,还是先偏重于功效的“达”?在策略上是选择“归化”呢,还是“异化”?所有这些问题,面对前述那种对应性程度高、规范性强的文本/语料的时候,是更容易找到统一或兼顾点的,也因为如此,在高对应性文本的翻译中,“信达雅”的问题就不会那么突出,乃至不容易被感受到。只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学科背景知识,一切都按照规范在译语中做对应性表述,一切都用普适性概念和逻辑表达方式作语言转

换,很少有模糊、歧义的空间。就像前例中的电脑说明书这种工程技术、自然科学或者日常信息类文本,其原语和译语的对应性本来就非常高,那就谈不上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因为相关概念和句子已经有非常规范的表达方式了。只有面对那些对应度弱的文本,面对语义多元、模糊的文本,特别是文学文本,或带有“文学性”的文本时,这些“问题”才会浮现出来:一方面体现了翻译操作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种操作对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求。所以,在文学翻译中才会有很多——就像译介学理论所呈现出来那么多的问题。

这样的文本/语料的差异区分,就可以体现出文学翻译在所有的翻译实践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从消极意义来说,文学翻译是最难以实施,也最难以展开研究的一个对象,因为问题复杂而纠结。但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反倒又体现出文学翻译的一种特殊优势,也即文学翻译或者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在整个翻译学领域,恰恰是最具有理论价值的一个部分。如果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行为,那么文学翻译所反映出来的跨文化问题是最典型、最全面、最集中的。跨文化的各个层面,原语文本、文本发生的文化背景、文本展开的话语语境,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权衡,译者对译本效果的预判和设定,译本在译语文化时空中的客观效果,等等,都在文学翻译的时间流程中得以呈现。

到这里可以概括一下。正因为文学翻译的弱对应性,它最突出地体现了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所能够反映的各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尽管翻译实践日益渗透到当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翻译研究不断进展,各种翻译理论不断涌现,但文学翻译始终处于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位置上,从文学翻译的观察与研究中,可以延伸出很多翻译作为跨文化实践的理论问题。它的翻译行为是有难度的,但同时所反映的理论问题又是最集中的,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文学翻译作为弱对应性文本的跨文化转换,它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是相对于强对应性文本的翻译,文学翻译体现出明显的译入和译出的向度性。我提出“向

度”这个概念,试图用来说明文学翻译的方向性特点,比如在英、汉语言之间,英译汉与汉译英就处于不同/相对的方向上,或者说基于特定翻译主体的母语与习得语关系而言的“译入”与“译出”的区分,就是翻译行为在语言转换中的不同指向性。结合前面所说的原文—译文强对应和弱对应的区分,这种向度性,对于科技类或信息类的文本来讲显示度并不高,也即译入和译出间所遭遇问题的差别不是很大,有时候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还是以计算机说明书的翻译为例,对于特定译者而言,不同的翻译向度,比如英译汉或者反过来汉译英,不同方向的工作,性质与难度的差距不会很大,回译之后文本的内容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如果换作文学文本的翻译,就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了。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在《走向翻译科学》(*Toward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中曾举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位丹麦的报纸编辑/作家撰写了一篇700多字的短文,以洗练的文字、富于韵律的语句,描述了森林中的气味、色彩以及四处出沒的飞禽走兽给人的愉悦之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篇不错的散文。随后他把短文依次交给瑞典、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翻译家去接续转译。最后,当他要求一位丹麦教授将法译本译回丹麦文时,这位教授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是:这样的幼稚之语实在不值得浪费时间。可见文学性文本的翻译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它们大都经不起“回译”。

我们同样可以设想:先把一首英文诗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把中译本回译成英文,或者反过来,那回译的文本与原文将有多大的差别!因为诗歌是文学这一弱对应文类中对应性最弱的文体,所以诗歌的难译甚至不可译,是最突出的。据传出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言“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指出的就是这个事实。要是同一首诗歌在两个向度的翻译不是出自同一个译者,他们又不在同一个时代和文化语境中,那差别更是难以想象了。在这个意义上,译入和译出的向度性在弱对应文类的翻译中,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就变得非常重要,无法忽视。

可见,我们在讨论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时,

很多理论前提我们都要弄清楚。我们采用某种翻译理论,是讨论文学翻译的译入问题还是译出问题?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译入与译出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一二十年来的一些颇为热闹的话题,比如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我们在思考与研究时,就应该首先明确讨论的前提,也即与文学“走出去”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及其理论,和“走进来”——也就是今天讨论的汉语翻译文学的相关问题,是在不同的翻译向度上。在不同的翻译向度上,很多翻译理论、文化理论的适用性和适应性虽然有相通之处,但运用的方式和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不同的译者主体、母语与习得语的不同组合、同一译者的不同翻译向度(即译入还是译出),译者对翻译的对象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效果等不同层面,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译者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原语翻译(转换)成什么样的译语,就决定了这一个译本呈现出来的状态。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作为弱对应性文本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管是译入还是译出,其最后效果都要取决于译入语的背景,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其传播与接受的效果归根结底取决于接受方(需求、期待等接受条件和接受方式),而非取决于(按传播学的说法)信息的发布者。

#### 四、作为国别文学的汉语翻译文学

以上说明了翻译文学之于翻译学的特殊意义。接下来要说说“翻译文学”前面的定义“汉语”,也就是要追问一下,汉语翻译文学之于翻译学有没有、有什么特定意义。这就涉及翻译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国别文学区分系统中,汉语翻译文学的国别文学属性如何?引发汉语翻译文学的国别争议,不单纯是一个理论追问,更有事实为前提,那就是近代以来汉语文化空间里大量译作的存在和翻译实践的广泛参与度。

先说译作的数量。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统计,自1917至1949年的32年间,全国共出版文学书目13500种,其中翻译书目3894种,年均122种,占比达29%,也就是说,翻译

书目在所有出版的文学书籍中占比近三成。这个比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今基本不变,大致维持在25%到30%之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8年的一份统计材料,说据美国的一项相关研究,在美国出版物中,外国文学译本在所有文学出版物中的占比是3%,后来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这个3%又展开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这个3%的占比,是把外国文学研究著作也计入了。如果仅就外国文学译本而言,占比仅0.7%。<sup>①</sup>这个数据和中国相对照,差别就非常大。这也恰恰可以说明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空间里数量之多。同时也与我前已提到的所谓文学翻译之向度的重要性相关。

再说文学翻译广泛的参与度。自近代以来,中国作家参与外国文学的汉译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译家”林纾(他本身就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传奇,也是很值得从包括翻译学在内的不同学科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对象),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家做翻译成为一种时代风气。回顾文学史,新文学的第一、第二代作家中,绝少没有做过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鲁、郭、茅、巴、老、曹”还都是重要的翻译家。

正因为外国文学的汉译“成风”,译作量大,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庞然的存在,于是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它算个什么东西呢?关于这个问题,谢天振先生在他的《译介学》中就有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汉语形态的翻译文学是哪一国的文学呢?比如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这样的问题,恰恰在翻译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才会被凸显出来。如果按翻译文学的传统理解,仅把翻译看作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那么,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也是英国文学。但是谢天振旗帜鲜明地提出,汉译外国文学作品应该归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它们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展开,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理论及其观念不断被接受,尤其是译介学理论在汉语学术界的出现,我们逐

① 康慨:《百分之零点七!美国作家为何十七年无缘诺贝尔奖》,《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

渐发现,英语莎士比亚和汉语莎士比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汉译莎士比亚的看法,慢慢演化出不同的理解方式,它一方面是英国文学,但同时又是中国文学。这一汉语翻译文学归属的争议,其实就是文学译本的文化/国别归属的争议。我在这里不做绝对的判断与选择,而且出于我的理论考量也不想做这种二选一的判断,但可以借此机会把问题再次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我认为,关于翻译文学的国别/文化归属争议,无非是按照原语著作权或译语著作权来确认而形成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对朱译莎士比亚而言,原语著作权属于莎士比亚这个英国作家,所以它属英国文学。但如按译语著作权来论,它是朱生豪翻译的,用汉语来表达的,在汉语语境下被接受并发挥其文学与文化功效的,所以它又是中国文学。两种观点逻辑上似乎都有道理,又都不尽然。所以我曾经尝试做过一个分析<sup>①</sup>,认为汉语翻译文学的归属,既是外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也就是说,无需在前述两种观点中做排斥性的选择。

在我看来,随着文学学术的当代进展,翻译文学越来越凸显出它对于既有学科的反思意义。由此,我们的文学观念,包括国别文学观念也面临新的问题。我们原以为国别文学的边界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有各自清晰的边界,但随着翻译文学归属问题及其争议的出现,我们发现这些“边界”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清楚楚。问题不仅存在于国别文学“之间”,也在国别文学“之内”,如中国文学内部本来就是多元的,它不仅有汉语文学,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也有相互翻译的事实。这样,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内部的多元性、复杂性,在外国文学经翻译引进中国文学空间之后,其内涵的复杂性又进了一层,除多民族文学的创作及其相互翻译、接受之外,又加入了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因此,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翻译文学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来:从原语角度看它是外国文学,从译入语角度来说,它又是中国文学。因此,我们不妨这样来概括,如果把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话,它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针对这个特殊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传统国

别文学的交叉与边缘地带,它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是具有某种中介性质的、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既属于中国文学,同时又属于外国文学。在不同于创作文学的意义上,它好像属于外国文学;但和真正的原语创作文学相比,它又是一种中国文学,所以是处在一个过渡的、中介性的状态中。

再扩大一点说,汉语翻译文学给文学研究的启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路径得以呈现。这就是,一方面汉语文学只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汉语文学也不只归属于中国文学,这是文学系统复杂性的又一个面向的体现。尽管汉语文学创作主要是——或者说从数量上来说主要是在中国,但是海外华语文学就不是,或主要不是中国文学。事实上海外汉语文学谱系也非常复杂,其中像“新马”(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语文学,它属于地道的外国文学,虽然用汉语写就,但它是“外国人”写的,甚至讲述的也是当地外国人的故事,描写的是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文学作品,不过是在语言上共享了汉语而已,或者在文学作品所凭借的文化背景上,与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性,但是它肯定不是中国文学,你没办法把它说成是中国文学。当然,由此延伸出的复杂状况就更多了。从比较文学角度延伸出去,在海外“华语”文学之外,还有海外华裔、海外华人文学的范畴,它们不用汉语,而是用当地的语言来写作。不论是用汉语还是当地语言,这种语言对于写作者而言是母语还是习得语,情况又不一样。这当然就涉及更复杂的,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流散文学的范畴,其中涉及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以及翻译问题就更多。我们会发现,它和原来意义上边界清晰的国别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总之一句话,这样的问题追踪,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国别文学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翻译文学这个特殊的文类,在当代文学学术视野中,已经显现出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一点恰恰是传统国别文学研究所要面对的一些挑战。在这个意

<sup>①</sup> 宋炳辉:《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义上,作为国别文学史特定内涵的翻译文学,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待于国别文学研究去进一步展开。总之,从中国国别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汉语翻译文学,也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新近展开并值得进一步展开的部分。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今天才显现出来的,但它在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下得以开拓,特别是翻译文化研究及其相关理论出现之后,可供展开的空间比以前更加多元、宽广,虽然其中的很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还想补充一句的是:关于汉语翻译文学的思考,也会给英语国别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带来新的启发。这至少可以关联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汉译莎士比亚,从英语国别文学研究来说,意味着如何被外译,如何在不同文化和语言空间里,发挥其跨文化效用,换句话说,朱生豪的莎译为原语莎士比亚提供了哪些新的内涵?当然,对于英国国别文学来说,其外译指向不限于中国,但汉译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

第二个问题就涉及我们中国的学术了。如果我说的英美国别文学研究通常是指英国、美国文学研究界对自己国家的研究,那么中国学者做的英美文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应该放在怎样的学术空间来考量呢?而与翻译文学直接相关的是,在中国文学与学术空间里,大量外国文学,包括英美文学作品,都是以翻译文本的方式呈现的,尽管有许多专业人士可以通过直接阅读英文原著展开研究,但如从汉语文化空间阅读(包括研究)总量来说,通过译本阅读的还是占据主要的地位,其中主要是普通读者,但也包括数量众多的从事外国文学甚至英美文学研究的专业读者,尤其当他们要用其他语种的文学作为英美文学参照的时候。如果说,英美文学在中国发挥其文学效应,大部分都以汉语译本形式呈现,那么,我们很多读者心目中的英美文学,其实是汉语英美文学——汉语莎士比亚与汉语福克纳。这对于在汉语学术空间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英美文学?因此,汉语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特殊而重要的一部分。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首先区别于本土创作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特

殊的。那么它何以重要呢?因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翻译文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重要催化剂和重要参照体系。

汉语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实践,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体现。比如,自东汉以降长达千年的印度佛教的翻译东传,除了带来有别于本土的超越性世界观之外,因明学在中国的译介也推动了本土思想中逻辑思维的形成;同时也深度改造了中古汉语及其文学形态,具体表现在汉语音韵的自觉、词汇的扩大和语法的变革。梁启超在他的长文《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有具体的论述。汉语系统如果没有这一持续的佛经翻译实践所引发的音韵、词汇和语用等方面的变革,我们就很难想象,后来鲁迅所称的中国的“文学自觉”,如何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难想象后来中国文学尤其是格律诗歌的辉煌,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汉语翻译文学在近代以后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与古代时期相比更加深入广泛。作为新文学代表的鲁迅就是一个典型,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汉语翻译文学相对于中国新文学,它们的关联能有多深。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开始到翻译结束,他的绝笔是为一个外国文学的汉语译本作序。他一生介绍了14个国家、100多个作家的200多部作品,以其他方式涉及的外国作家就更多了。鲁迅译介外国文学、外国作家作品的文字数量也非常多,据统计超过250万字,也就是超过他的创作字数。从鲁迅的例子可以见出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重要程度。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汉语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论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sup>①</sup>在这篇文章中,我在广义上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即包括狭义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部分。文章系统分析了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大规模引入和功能发挥,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翻译文学则是其最直接和最突出的表现。近代以来大量汉语翻译文学实践及其翻译作品,其数量之多、持

① 宋炳辉:《汉语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续时间之久、对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为世界文学史和翻译史所少见,它从文学观念更新、文学语言的古今转换、文体系统的变革和重组等几个方面,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呈现了多学科的意义。有关的判断我在文章中都有材料和数据的分析,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参考那篇文章。

同时我也指出,翻译文学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在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创作方法与技巧的示范引导、文体范型的新变与重构、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与成熟,乃至中国文学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等方面,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这种外来文化资源对于本土文学的建构作用,本来是任何一个国族文化与文学历史的普遍发生的常态,只不过在中国近代以来,也就是“新文学”发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作用显现得尤其突出,其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文学时期。

### 五、比较视野与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意义

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文学翻译研究从来就是其重要的构成。早期法国学派理论中的文学“影响研究”中,就有专门针对翻译研究的论述,它被放在三大分支(流传学、媒介学和源流学)之一的“媒介学”中处理。在汉语学术界,由谢天振先生创建的译介学理论,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看,就是从其分支学科媒介学改进演化而来的,其渊源包括媒介学以及当代西方的翻译文化理论,正是这两方面的理论资源,培育了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理论。译介学理论主要侧重于翻译文本的生成语境、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以及译本文化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它在国际比较文学、翻译学等领域已经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当然,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除了比较文学媒介学和翻译文化学派理论的资源外,本土学术思想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发生的重要场景。这就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

对近现代翻译文学的重新审视和阐释,包括现代作家、翻译家兼学者的施蛰存和贾植芳两位前辈分别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和专辟翻译文学书目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sup>①</sup>,而谢天振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译介学理论的文章,正是借助于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先生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与读者见面的。<sup>②</sup>因此,译介学理论本身就是跨文化、跨学科学术资源的交流、碰撞下所构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创新理论。当然,除译介学对译者主体和翻译文本生成的研究外,文学形象学、比较诗学中的理论旅行等,也都和翻译文学史相关,也都是这些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汉语翻译文学的意义,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汉语翻译文学成就了新文学,锻冶了汉语的现代表达力,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品格。众所周知,文学的发生都离不开传统和现实的资源,因为作家是在现实中从事写作,书写的是其有感触的人生经验和与生命体验相关的物与事、情与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三大资源,传统资源和现实资源之外,外来文学与文化是其第三大资源,而汉语翻译文学就是外来资源最为集中的体现。当然,它作为一种外来资源,也可以不经过汉语翻译这一中介,直接通过原语进入到我们作家的阅读、创作和阐释系统中来,所以汉语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来文学资源。很多的作家、批评家是直接借助于原

① 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② “重写文学史”是陈思和、王晓明在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时提出的学术主张,这一专栏从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推出至1989年第6期结束,共发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探讨文章40余篇。主持人申明讨论宗旨是:希望通过“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专栏所探讨的问题是多年来困惑现代文学研究的症结所在,一经推出就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语(外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的,它们作为资源就被直接借鉴到创作和思想观念中去了,但就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整体,即包括了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文学流程各环节的整体而言,汉语翻译文学仍然是外来资源最集中的一种体现。

汉语翻译文学之意义展开的另一个方向是,它也是世界文学多元谱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汉语的创造性呈现(即汉语译本),使汉语文学之外的文学,包括西方文学和非西方的文学,得以实现其世界性转世重生,也使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本身,成为世界文学谱系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家大卫·达姆罗什所表述的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种定义方式: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这意味着,从动态的世界文学的意义上看,翻译文学既是世界文学的一种实现方式,也是民族文学显现其世界性的一种方式;汉语翻译文学既是世界文学在汉语世界的重生,也是汉语文学实现其世界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在最后回到这次演讲的主题,即“多学科视域下汉语翻译文学的意义”之前,我想先归纳一下汉语翻译文学的中国特性。如我一开始所说,世界各语种的翻译文学当然有其共通性,但是具体到中国翻译文学或汉语翻译文学又有它的个性,即它的中国特性。对这些中国特性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观察。基于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大量汉语翻译文学的发生正处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转型时期,从本土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形态和格局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正是汉语翻译文学使得现代文学区别于传统的古典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翻译文学是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学面貌。对于翻译文学改变本土文学的事实,若从其性质上来说,中国的情况可能和其他国家翻译文学具有共通的功能特性,但是在共通性背后,又有很明显的差异性。概括起来,这种差异性体现在我前面所分析的几个方面,那就是从汉语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空间里的文化地位和功能效应而言,翻译文学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更重要的是影响之深、之大。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就是汉语翻译文学相对于中国国别文学而言的

重要性,也就是中国翻译文学在世界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一种特殊性体现。所以,无论是历时还是共时地考察文学进程,虽说跨文化与跨民族的文学交流是世界文学历史的一种常态,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学及其发展阶段都像中国现代文学那样,伴随着如此规模、如此数量、又体现如此特殊和重要的文化发生功能的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实践,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汉语翻译文学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与西方强势文化、强势语言的文学对照中,两者之间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背后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而这一点正是值得我们不同学科去进一步关注的。

从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讨论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将文学的“译入”与“译出”相区分和对照,也是一个富有多学科意义的话题,也是观察与分析汉语翻译文学(和作为实践的文学翻译)的一种方法。以此考察中国翻译文学,可以见出它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大量“入超”现象,即外国文学的译入远远超出中国文学的译出,借用国际贸易的概念来说,就是文学的“入超”。这个概念,美国文学理论家、比较文学家韦勒克在他著名的《文学理论》中是用来批判传统法国学派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我这里借过来作为一种比喻而反向使用它,以描述中外文学关系史和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一直走在一条走向现代、融入世界、摆脱屈辱和寻求本土文化复兴的路途上,反映在翻译文学领域,就是大量持续地译入外国文学,这种文学“入超”是近代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总体事实。尽管自21世纪以来“译出”的频率高了,数量也多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但似乎仍没有根本地扭转文学“入超”的基本格局。我觉得这一点是汉语翻译文学在至今为止的世界文化交流语境中反衬出来的另一个特性。

总之,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有它的系统性。汉语翻译文学只不过是世界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即以汉语形式呈现的翻译文学。(下转第21页)

文化演化中的学术建构功能,包括区分其描述现代发生和回溯历史这两种不同的语用方式,因为如果承认世界文学是一种现代发生的文化事件,那么,将这一概念施用于它发生之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以今揣古式的“所指滑动”。作为比较文学的核心概念,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更应该在多元文化的时空中揭示文学的跨文化对话功能,以及一种动态的、面向未来种种可能性的文学/文化创造功能。<sup>①</sup>

这里所讨论的虽然是如何对世界文学概念作谱系分析的问题,但很显然,所有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炳辉试图在哲学高度上超越旧有认识论框架,拒绝滞留在“物的世界”,而向“事件”“过程”以及“谱系”奔赴的努力。世界文学是复数的、未完成的,因为世界是复数的、未完成的。

## 五

细心的读者也许看到本文的最开头时就已知道了,这篇读书笔记的题目乃是“戏拟”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这样做,我当然并不企图

自比山仑先生,炳辉的心性也明显不是沉郁顿挫的杜工部类型。我所偏爱的,是“心解”这个说法,它能更好地表明,这篇阅读札记,不是对炳辉文章与思想的“详注”(仇兆鳌),更不敢是“镜铨”(杨伦)或“臆想”(王嗣奭),而仅仅是一次将心比心、以心论心的对话与解读。这也同时意味着,它是不完善的、未完成的——虽然不是“事件性的”,而是“心灵性的”。一定有不少谬解的成分,请老友海涵。

谨以此阅读笔记,遥祝炳辉兄荣开六秩,永葆“启东人”的品格、心性与才情。余不一一。

**【作者简介】**张辉,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执委会委员。曾为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并在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图宾根大学及澳门大学等校短期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与思想史、文学解释学、中德文学与美学关系等。

<sup>①</sup> 宋炳辉:《世界文学的语义分析及谱系研究的可能性》,《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上接第15页)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再拓展一点的话,还可以涉及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译,当然还包括中国文学的外译。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翻译文学也是一个多元系统。系统性的文化现象本身就需要我们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展开有效的翻译文学研究,不是有可能从多学科的路径进入,而是必须从多学科的路径进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多角度去阐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翻译文学,才能系统地考察它在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才能完整地阐释它的文化功能。即便是这个谱系中的个案,也可以、并且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地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是中、外语言文学学科中最具跨学科特性的领域之一,需要研究主体以多

学科的、学科交叉的视角和态度来对待它。

**【作者简介】**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汉语翻译文学和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著有《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徐志摩传》《想象的旅程》等著作十余部,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前两者分别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人文社会科学,2019)和中国国家图书奖(2018)。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4)、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016),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